

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辨析 ——以《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为考察对象

王璇

作者简介：王璇，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暨海外华文文学。电子邮箱：wangxuannju@126.com。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由美国学者史书美提出，并在《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2007。以下简称《视觉与认同》)中首次做了阐释，即指“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及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网络，数百年来改变并将中国大陆的文化在地化”(2013:17)。

2017年，史书美推出《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Against Diaspora: Discourses on Sinophone Studies*，以下简称《反离散》)，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做了更为系统的阐释。虽然其部分内容已发表，但经系统整理后的“华语语系”文学，其概念和例证被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同于《视觉与认同》中将概念放置在具体的电影、艺术作品中探讨，《反离散》更具有理论高度。在“导论”中，就将以前没有深入解释的华语语系概念做了系统介绍，在后续章节中贯穿“离散有其终时”和“去中心”(2017:47)两个理论重点进行阐释和论证，阐明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华语语系”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问题、“华语语系”的理论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意义、“华语语系”文学与后殖民理论框架的关系等问题，并以美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文学现象作为例证进行探讨。

史书美虽是“华语语系”文学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但由于其理论框架的包容性不足，导致争议不断。理论边界的僵化设定、对“在地性”的强调，都限制了其对作家、作品的定义，加之其前后矛盾的阐述，使得这一理论在阐发华语创作时捉襟见肘。

一、“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和边界

在《反离散》中，史书美延续了其在《视觉与认同》和“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2004)中的理论框架，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应强调在华语语言族群中，以“他/她使用何种语言为分野”(2017:40)，强调忽略种族身份，是一种“跨国家和民族的、全球的，包括那些位于中国和中国性边缘的各种华语形式”(同上)。“华语语系”文学之所以近十年来争议不断，正是因为史书美的这一设想和边界存在巨大漏洞。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有不妥之处。史书美有感于美国学界使用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和 Literature in Chinese(华文文学,中国之外的文学)指代中文创作,对照 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等殖民地文学提出 Sinophone 这一说法。同时以东亚许多地区能以汉字笔谈而得出结论——中国是文化帝国,“这与法语区的存在有相似之处,它的出现乃在于法国在非洲与加勒比海的帝国扩张以及文化与语言的殖民”(2013:54)。这些说法显然十分荒谬。如刘俊所说,Anglophone、Francophone 意指英、法殖民地使用殖民宗主国语言的现象,这一指称代表被殖民地区与殖民宗主国之间“平等地”构成了一种“语系”关系(52),以此颠覆殖民宗主国的中心地位。而中国不是殖民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语社群的形成也与英、法殖民地不同,因此史书美如此类比而来的 Sinophone 是十分不妥的。而东亚汉语圈的形成更不源于中国官方的强制推行,日、韩沿用汉字书写系统的基础是保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而史书美仅凭书写系统的相似性就断定东亚汉语圈与殖民形成的英语圈、法语圈相同,显然不合理。

其次,“华语语系”文学定义的边界有双重标准的一面。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文学强调“声音和书写上的多语性及多文性”(2017:20),其内容应该“包含位处民族或民族性边陲的各种华语社群与它的表述”(2017:23)。史书美将汉族人书写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则被统摄在“华语语系”文学麾下,强调两种社群的中心与边缘地位。然而,“华语语系”文学声称忽略种群身份,同时又以语言区分族群,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华语社群——汉族——排除在外,是令人费解的。

在指代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地区时,“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又呈现出不同标准的一面:在中国台湾,国语、河洛话、客家语等不同形式的华语,被定义为华语语系台湾文学,而原住民语言文字、殖民时代遗留的日语创作、拼音罗马字母等是与华语语系台湾文学并列存在的,它们同属于台湾文学。换言之,“华语语系”文学在指代台湾时,则只包含华语创作,而不包含少数民族的语言创作了。

“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在指代中国大陆时剔除了主流族群的中文书写,将少数民族的表述纳入其中,却忽视了这些族群运用的语言并不是“华语”;而在台湾则扩大了这一边界,采纳主流的华语书写,排除南岛语系其他创作语言,这一双重标准与其“去中心”的批评维度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对于是否强调作家的种族身份,史书美表述了两种不一致的标准,“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变得模棱两可,这又进一步导致她在使用这一概念定义具体的作品时,显得前后矛盾。

二、萧红和高行健——如何定义一位作家、一部作品?

“华语语系”文学将世界各地华语社群的创作统摄到一起,与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华语语系”文学仍强调具体的华语社群具有特殊性,试图定义其在地性和边界。例如,马来西亚华语社群的创作被称为“华语语系马来西亚

文学”,属于马来西亚文学;台湾的华语创作,属于“华语语系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①换言之,“华语语系”文学在定义作家、作品时,强调的是其“在地性”。

但在对具体作家的定义和归类中,对“在地性”的强调又导致了自相矛盾的分类标准。在《反离散》中,史书美认为萧红的《呼兰河传》属于香港文学,其理由有二:《呼兰河传》写于香港,书中描述的东北是萧红在香港想象的东北。换言之,史书美将《呼兰河传》放置在香港的创作环境中,是其强调香港文学“在地性”的一环。

然而《呼兰河传》并非完全作于香港,香港对于它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从创作地点看,《呼兰河传》的创作从1938年萧红在武汉时开始,到1940年在香港最终完成,书稿跟随萧红四处辗转。香港是萧红的最后一站,对家乡的想象和塑造在其流亡途中就已完成。换言之,香港在《呼兰河传》的创作过程中可有可无,而史书美仅凭作品完成于香港、萧红逝于香港,就认为作品属于香港文学,是片面的。《呼兰河传》展现了萧红离开东北后,对家乡由憎恨转为眷恋的情感,这种想象跟随萧红从上海至武汉,再到香港,的确与其“出走”有关。而史书美错置了香港与《呼兰河传》的创作关系:不是“出走”的目的地香港造成了呼兰河形象的塑造,而是“出走”本身造就了《呼兰河传》。

所以,并不是在香港写成的作品就属于香港文学。史书美将《呼兰河传》纳入香港文学的目的,“是一种在地性的追求”(2017:190)——为了“在地性”的追求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评判标准是有失妥当的。《呼兰河传》的香港文学特性,是一种不存在的“在地性”——香港既没有提供一种身份,也没有真实地在场。

同时,史书美这一评价标准也是矛盾的。按照这一评价标准,高行健在国内完成的《绝对信号》《车站》等作品应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而史书美却对此讳莫如深,转而强调高行健已入籍法国,将他的作品视为法国文学。

高行健的代表作《绝对信号》(1982)、《车站》(1983)均完成于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团工作期间,长篇小说《灵山》(1982-1989)也主要完成于国内,这些作品均创作于他1997年入籍法国前。《灵山》中表达的禅宗思想,更是源自他在四川一带的旅行体验。按照史书美对萧红作品的定义标准来看,《灵山》等作品创作于中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应属于中国文学。而史书美强调《呼兰河传》的香港“在地性”时所忽略的地域身份,在指向一位体现中国大陆特色的作家时,却不愿意承认作家的“中国性”,转而执着于揭示作家的国籍身份,正展现了她所说的“在地性”同样排除了中国大陆。

不仅如此,史书美曾特意指出在“华语语系”文学中,作家及作品的语言和国籍并没有等价关系,那么她又何以强调高行健的法国身份呢?很显然,“华语语系”文学看似放下了对作家地域身份的探讨,强调作品的“在地性”,但在指代中国大陆时,存在明确的双重标准:“在地性”只能指代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社群,当一位作家展现了中国大陆的精神与现实风貌时,就被选择性忽略了。

那么,既然史书美的划分标准是片面的,如何划分一部作品、一位作家的地域范畴呢?除了考虑不同华人社群的国籍身份、创作背景、语言外,作品内容、精神内核与情感都应该作为标准来综合考量。例如,张爱玲的《小团圆》作于1970年代,却没有体现

① 台湾文学除了华语创作的作品,还包含日语、英语、拼音罗马字母等少数语言。

香港、美国生活的必然影响。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对中国大陆的描绘,在于其“离开”,而离开的地可以香港,也可以是美国。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其精神依归是指向中国大陆的。

三、“去中心”以后:“华语语系”文学走向何方?

“华语语系”文学强调的“在地性”只是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华人社群的创作特点,显然这种强调边缘创作特质的理论有着“去中心”的批判维度。那么,“华语语系”文学为什么要“去中心”?

史书美有感于中国大陆汉民族华语书写的主流地位,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社群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提出各地华语社群的不同特质,抵抗的是“中国性”——“华语语系”文学最初是反对中国中心的。虽然史书美再三指出“华语语系”文学反对任何中心,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在地性、独特性建构自身,“使台湾文学的世界性浮现于世界地图上”(2017:138)——其目的显然在于让台湾文学与其他众多“华语语系”文学联系到一起,提升台湾文学在华语社群,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在这一维度上,台湾文学的世界性取代了史书美魂牵梦萦的“在地性”。然而,史书美忽略了台湾文学之所以能够在华语社群中占据一席之地,正是因为它的“中国性”,即与其他“华语语系”文学的共通性,而非世界性——这种世界性与“在地性”恰恰存在巨大矛盾。

以台湾乡土小说和新乡土小说为例。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台湾乡土小说,在华语社群中拥有颇高声望,正在于其展现了乡土中国传统在城市化中如何丧失与自救的风情,引发了其他华人社群的共情,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而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新乡土小说则受到了冷遇。新乡土小说创作致力于书写台湾社会的“在地性”与特殊历史,虽然审美品格仍高,但至今未能被台湾以外的华语社群广泛接受,与其“在地性”无法使其他华语社群共情有极大关系。其对台湾“在地性”的极端推崇导致了自我封闭,限制着新乡土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因此,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共性,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对“在地性”的过度强调,反而扼杀了台湾文学的传播。

此外,“华语语系”文学反对的“中心”,在不同情境中存在不同含义,又显示出更多漏洞。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文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目的”(2017:243),马来西亚华人处于弱势,就应去马来化;在中国大陆则应提倡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在以华语作为主要创作语言的台湾,是否也应反对这种主流形态的“华语语系”文学?史书美认为大陆汉民族的创作构成了相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其他华语社群的中心地位,因此要反对这种中心主义。如果将这套逻辑用于台湾,既然“华语语系”文学反对一切中心,那么台湾同样存在中心主义,所以“华语语系”文学也应反对台湾主流华语社群的华语书写,提升原住民创作的地位。然而,史书美对此隐而不谈,却再三声明台湾文学在东亚文学、世界文学版图中的边缘地位,其意识形态意味昭然若揭。

因此,“华语语系”文学的“去中心”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而并非史书美所声称的那样开放,同时更企图走向另一种自我建构的中心:“华语语系”文学掩盖了台湾地区原住民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因而也是一种霸权话语。当台湾文学成为“华语语系”文

学的领头羊,它就变成了其自身反对的中心和权威,走向其反对的一面。因此,“华语语系”文学适用于边缘的、需要争夺话语权的地区,一旦台湾文学走向中心,这一概念就会被弃置了。

因此,“华语语系”文学既反中心,又在争夺中心。当台湾文学将自己分离出来,其所建立的新“华语语系”文学便是以台湾为中心的、其所反对的另一种霸权了——“华语语系”文学的去中心指向了谋求台湾文学在华语社群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去中心”的目的是建构另一种中心。事实上,“华语语系”文学声称“当中国中心论者放下身份,以开放与公正的态度面对差异,也许华语语系圈就仅是历史境况的描述词,指涉所有运用华语(多样的汉语)的地区,当然也就包括所谓的中国中原”(2017:70),也明确说出了“去中心”掺杂的政治考量,而非仅止于“去中心”。

四、余论:“华语语系”文学无法解答的问题

过多的政治考量让“华语语系”文学不仅存在定义边界、“去中心”等问题的自相矛盾,更存在众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首先,被置于“华语语系”文学中的作家与作品,需强调其“在地性”,还是共通性?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应侧重“在地性”,那么就必须给作家一种文学身份,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落入政治的框架。而另一方面,“华语语系”文学的共通性则让华人社群表现出拥抱(华语)世界的姿态;具有华语社群共通性的作品相比于顾影自怜的“在地性”作品更能引起华人族群的共鸣,进而广泛传播。这似乎是一种吊诡:“华语语系”文学强调华人社群的差异性,而差异性又成为其发展瓶颈。新加坡学者陈荣强(E. K. Tan)认为,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造成了“普通话”和“方言”的抗衡关系,因此大力倡导以“在地性”的闽方言进行交流。虽然这无可厚非,但以方言作为表达语言势必造成难以交流的状态,致使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学无法走向世界(Tan 26-27)。

其次,“华语语系”文学无法处理华语写作的文化指向、语音和文字的关系等问题。“华语语系”文学既强调以“华语”统摄华语地区,又声称这“象征的是某一语言群体对其他语言群体施展的霸权,以及对异质性的压迫”(2017:169),显示了其定义的“精神分裂”与张力。

另外,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华语社群亦存在特殊性。如何定义瓦历斯·诺干、夏曼·兰波安等使用华语书写的台湾原住民作家?夏曼·兰波安虽使用华语创作,但通常以汉字表达达悟族的符号和语意。史书美一方面认为台湾的国语、河洛话、客家话等属于“华语语系”文学,一方面又回避原住民运用华语却指向自身语言文化符号的创作。这显示了“华语语系”文学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史书美一边表示语言并不决定认同,一边又指出当移民的后代不再使用汉语,他们便“不再是华语语系群体的组成部分了”(2017:48),将语言转变作为离散终结的标志。那么语言究竟能否成为定义族群的标准?史书美认为华人移民“离散有其终时”的标准是对汉语的弃置,却忽略了在语言之外,文化情感与认同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最后,史书美强调对华研究应关注殖民的一面,其论述策略在于将中国假想成殖民者,并将研究放置在去殖民的框架内。但这种“以西方民族国家思维来解释中国多元一统的政治文化格局”(张重岗 78)的思路,显然只是对西方概念的生搬硬套,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境况,因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史书美致力于建构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虽统摄了华语社群的大部分文学现象,但由于其意识形态考量和理解偏差,其定义的边界有其僵化之处。它不仅将中国大陆的主流华语书写排除在外,同时也并不能完全解释其他华语社群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更存在很多无法纳入的群体及作品。虽然“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提升了对马华文学的关注度,让海外汉学对华语创作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大陆,但这一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目的值得警惕。

相比之下,王德威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更包容,将中国大陆的华语书写及更广的内容囊括进来,把这一概念描述为开放式的、可以讨论的定义。不过,回到史书美提出的“华语语系”字面本身,又显然无法指称一些处在交叉地带的文学现象,如哈金、汤亭亭等人的英语创作。因而“华语语系”文学的提法,或许将来会被更为精确的概念来规范,但在当下仍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文艺研究》11(2015):51-60。

[Liu, Ju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riticism of ‘Sinophone Literature’”(hua yu yu xi wen xue de sheng cheng, fa zhan yu pi pan; yi shi shu mei, wang de wei wei zhong xin).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1(2015):51-60.]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2017年。

[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Discourses on Sinophone Studies* (fan li san; hua yu yu xi yan jiu lun). Taipei: Linking books, 2017.]

——:《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杨庆华译。台北:联经出版,2013年。

[---.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shi jue yu ren tong; kua tai ping yang hua yu yu xi). Trans. Yang Qinghua. Taipei: Linking books, 2013.]

Tan, E. K.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Literary World*.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3.

张重岗:“‘华语语系文学’的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4(2018):75-85。

[Zhang, Chonggang. “The Cultural Logic of ‘Sinophone Literature’”(hua yu yu xi wen xue de wen hua luo ji). *China Social Science Review* 4(2018):75-85.]